扑朔迷离的西域古乐谱

扑朔迷离的西域古乐谱

黎羌

古代人因为缺乏科学知识，常将那些类似文字、瞬息万变的云气为"自然天书"。由此引申而来，亦将那些早已失传，难以辨识的古代文字和乐谱为"天书"。新疆居于中亚腹地，自古以来有许多民族在此活动，中西方许多种文化在此汇聚，天长日久，自然而然，这里便成为珍藏迷离扑朔的古"天书"历史博物馆了。

翻开新疆近，现代文物考古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发生过许多饶有情趣的事，流传过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轶闻笑话。同时也产生过不少是人痛心疾首的文物盗窃案所导致的人生悲剧。

可能在我国偌大的土地空间，再找不到比新疆拥有各种古代语言文字还要多的地方。在这里，仅目前所出土的古代文书来看，卷帙繁杂，浩如烟海，其形式与内容异常丰富，古代语言方面如汉语、梵语、古代与田塞语、厌哒语，古代库车语、古代焉耆-高昌语、粟特语、古代叙利亚语、回鹘语、中古波斯语、安息语、阿拉伯语、吐火罗语、西夏语、古代藏语等。古代文字方面如汉文、婆罗米文，佉罗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西夏文、巴思巴文等。古文字内容除了大量宗教文卷、书信、文契之外，还有许多古代文艺作品，其中理所当然要包括一些尚待辨识和解读的古代西域乐谱。

从新疆各地考古发掘出来的文书资料千奇百怪、神秘莫测。我们所熟知的除了一般的纸和绢以外，还有诸如木简、桦皮、皮革和贝叶等类型，其中的贝叶文系铁笔在贝多罗树叶上所刻写的佛教文字。公元一至十世纪，古印度佛教徒携带大批写有经、律、论三藏的贝叶经，前往中亚各地和中国的新疆、西藏地区、以及尼泊尔等地弘扬佛教。这些地区的佛教徒也接踵而去古印度取经，归回时携带有大量贝叶文。新疆出土问卷的存放装订形式也很独特，除了人们所常见的书册式，还有各式各样的书匣等。

在新疆西域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之一是古代焉耆-龟兹语文和古代和阗语文的发现和解读。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等地发现了一种婆罗谜字体书写的大量文卷，以后经欧洲语言学家考证，此为甲种或乙种吐火罗语。尤值得重视的是用古代龟兹语、焉耆、高昌语写成的文学作品中，有一批古代西域剧本，其中有关于米勒的剧本残卷，还有关于佛弟子难陀生平的剧本，剧中还明确地标示供演唱的曲牌名称，关于古代和阗语文，经解读后确定为东伊朗语，亦称为古代塞语。

关于被视为"天书"的古文字的发现，还有一段非常偶然而有趣的故事。早在一百年前，随着外国探险考察队纷纷来中国西北地区，一位叫达格列什的英藉商人也来到新疆，然而在他把货物倒手完，将钱攒够时，却在风雪交加的喀喇昆仑山口，被一位浩罕国人帕坦和一位维吾尔人达德穆罕默德图财害命，当场杀死。

为了追捕缉拿凶犯，正在喀什噶尔旅游的英军少尉鲍尔被派出执行任务，在他未到库车时，意外得到一本木板夹着的厚厚的古书，他翻开一看，惊喜万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凭着自己敏锐的直观感觉，断定这本古代经书将会为他带来殊荣盛誉。

鲍尔为此私自中断了追捕任务，提前返回印度西姆拉，请著名语言学家赫恩雷鉴定此书，其结果比他想象还要振奋人心。原来这本古书上记载着早已失传的中亚最古老的婆罗米文，亦称吐火罗文，这可是一件无价之宝，自此古书被命名为"鲍尔古书"，而这位英军少尉也为此名垂史册了。

在此之后不久，有人想步鲍尔的后尘，在文书考古上也爆出个新闻，然而没想到却出了一个大丑闻，这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他年轻时离开布达佩斯，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前赴印度卡哈尔东方学校和加尔各答大学任校长。自从他读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及得知鲍尔古书的未源后，梦寐以求想潜入中国新疆大发一笔横财。

20 世纪初，斯坦因终于获得时机，他由克什米尔出发，取到吉利雅山口，直插喀什噶尔，然后转入和田地区，他在此地的丹丹乌里克获得一大批古和阗文，佉卢文和汉文经卷书以及大量古代佛教文物。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以同样在和田也蒙受了一场奇耻大辱。

当时他在民间收集购买到一批古文字书籍，兴冲冲带回英国伦敦，欺世盗名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较之鲍尔古书更有价值的中西古文写本。然而事隔若干年，此案被告发，原来是巫医阿克亨假造的一些下三烂的赝品。

较之古文字，西域古乐谱的出土问世以及识读解译可谓更富有神秘色彩的事了。我们所说的古乐谱系指古代先民为了记录音乐而采用的各种书写形式与方法。譬如原始人类以结绳记事时，同样也用绳鞭打结记录音乐，称之为"绳谱"；我国古代发明了汉文字，有人则以文字谱标识古琴指法；古老的律合字谱即以十二平均律的名称显示高音，另外还有"简字谱"或"俗字谱"；如今我国民间艺人惯用的工尺谱的前身筚篥谱，是以简单文字表示指孔音位；再则还有减省笔划的"半字谱"或"减字谱"。

据专家学者考证，我国最早可以供演唱与演奏的乐谱称之为"声曲折"，这是依据曲调的高低上下而绘制的一种乐谱。然而遗憾的是此种古乐谱原型早已失传。流传后世的只能见到藏传喇嘛教僧、俗界教派使用的"央移"谱。诸如学术界所知的青海札什伦布寺窟宗下密园乐谱。另外，在我国至今比较完善的保留下来的古乐谱还有《碣石调幽兰曲》，为后人生动地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度发展的音乐文化。

古代西域有没有历史悠久，富有艺术和学术价值的古乐谱呢?据有关史书记载和陆续考古新发现，回答是肯定的。在我国隋唐燕乐盛为发达时，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七部乐均应有各自的乐谱，其中尤以兼收并蓄的龟兹乐为甚。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有一次唐玄宗看见宁王正在击鼓，发现他所依循的是龟兹乐谱就是一个证明。

西域天竺乐最初使用的古乐谱，是由梵文演化出来的"梵字谱"。我国佛徒高僧为了翻译佛经，首先需要学习梵文，需要去钻研《婆罗门书》，"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沙门守温创制了三十六字母，定会翻做《释昙章》，即《普安咒》，作为学习梵文的教材。梵文的传入，不仅促进了汉语中反切字母与等韵的产生，而且还有力地影响和推动了我国民族音乐的长足发展。

据宋陈旸《乐书》所记载，唐代宴乐所用"半字谱"即源于龟兹筚篥谱字，而此种古谱字最初为梵字的原形，历史上天竺的"梵字谱"传入古代新疆，使此地龟兹筚篥谱得以发展和完善。古代西域乐谱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分为两个系

统一是"手法谱"，一是"音位谱"。"手法谱"于唐五代后被废弃，而被称为"管色谱"的"音位谱"则系统的发展为近世的工尺谱。

据历史所载，唐玄宗改编加工成为《霓裳羽衣曲》，故乐曲听起未"如闻梵呗之声"。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宋人江少虞在"蒲中逍遥楼楣上"发现"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可是因"字训不通，莫知是非。"可见此种乐曲决不是本地所固有，而是外来所传。

自龟兹筚篥谱传至唐朝，前后进行过两次重大的改革。一次由初唐的张文收发起，他认为隋唐所编纂的乐谱不太完备，而在创作唐燕乐《景云河清歌》时，参照龟兹筚篥谱进行改革。再一则是唐玄宗时，他仿效宁王"所读书皆龟兹乐谱也。"除了"制新曲四十余"外，"又新制乐谱。"随后如《辽史音乐志》中胡乐乐谱谱字,南宋《白石道人歌曲》所用谱字,宋张炎《词源》应指字谱谱字,宋陈元靖《事林广记》所列谱字，以及现存的西安鼓乐乐谱所用谱字均与西域龟兹筚篥有着直接或间接传承关系。

最令人关注的是通往西域各地的重要门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在此问世的许多首古代乐谱,更加证实了西域与丝绸之路沿线曾蕴藏着极其丰富多彩的古乐宝藏。众所周知的所谓敦煌古谱,系指《敦煌琵琶谱》，此为原藏于莫高窟十七窟的敦煌卷伯三八０八卷背面书写的二十五首曲谱。

此件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于本世纪初被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窃取，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伯三八０八卷，写于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卷子背面背面的二十五首乐谱名称有：《品弄》《弄》《倾杯乐》《又慢曲子》《又曲子》《急曲子》《又曲子》《又慢曲子》《急曲子》《又慢曲子》《倾杯乐》《又慢曲子》《又慢曲子西江月》、《又慢曲子》、《慢曲子心事子》《又慢曲子伊卅》、《又急曲子》《水鼓子》、《急胡相问》《长沙女引》《撒金沙》《营富》《伊卅》《水鼓子》等，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弥足珍贵的古代乐谱，饶有兴趣的窥视到许多西域古代音乐歌舞的文化奥秘。

可能有人要问，关于敦煌古谱，亦称敦煌唐代琵琶谱，是怎样被发现而公诸于世?是如何被后人解译识读，最初他有何人抄写?抄录于何时何地?后来又是怎样辗转到敦煌来的?若能解开这一连串的问题与谜底，将对探研西域音乐史和古乐谱的流播实为至关重要。

高窟有一位名叫王圆录的道士，有一天早晨他在十七窟清除淤沙时，无意发现该窟北壁有一孔被泥封的小门，打开后惊喜的看到室内满满当当，盛装有各类经卷，写本和文物均四、五万件，诸如二十五首敦煌古谱，以及"音乐部"、"乐谱"、"琴谱"等许多珍贵音乐资料均在此藏经洞内。

敦煌莫高窟经洞的发现一经传扬开来，立刻引起全世界文化界的轰动，致使众多外国探险家争先恐后来到次地寻宝觅贝。特别令华人伤痛的是于一九0七年二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以考古名义潜行莫高窟，他在向导蒋孝婉的配合下，终于买通了王道士，从藏经洞挑选出大批贵重文物经卷，运至英国伦敦大不列颠皇家图书馆，其中就有含有音乐部的《新集时用要字》和《新商略古今字样提其时要并行俗释上卷下卷》。

让人更加寒心的是同年七月，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尾随抵达莫高窟，他以精湛的汉语博得王道士的欢心，一次就盗走古代文卷六千多件，"敦煌二十谱字表"和二十五首敦煌古谱同时被劫，后收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

我们由敦煌二十五首古代曲谱所载的讲经文卷子判断，可视为这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早的音乐曲谱，其中含有不少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的资料，它在我国音乐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从解放前到如今，我国专家学者对此文物的研究非常重视，早在一九四0年，向达先生即从巴黎图书馆拍摄回来《敦煌曲谱》的显微照片，他称之为"敦煌唐人大曲谱"。后来任二北先生在《敦煌曲初探》中称之为"工尺谱"，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称之为《敦煌唐人乐谱》。

为使沉睡千年古乐旧谱恢复历史的声响，国内外音乐学家为此做出长年和艰辛的努力。日本学者林谦三先生称其古乐为《敦煌琵琶谱》，并于一九五五年将二十五首全部解译成五线谱。一九七一年香港学者饶宗颐在参与编著《敦煌曲》艺术过程中，也尝试将二十五首转译成现代乐谱。在前人的研究结果基础上，上海音乐学院的叶栋先生于一九八二年发表了重要论文《敦煌曲谱研究》，并将二十五首古曲破译成带有特定节奏和韵律的五线谱，同时还组织乐队付诸于音乐演奏实践。

兴许人们不了解蹊跷内情，这二十五首敦煌古谱虽然问世于敦煌莫高窟

年闰正月。据有学者考证，敦煌僧侣梁行德一行曾入贡洛阳，为了参加千僧斋的"斋僧法会"上讲经、讲道和宗教乐舞表演出，事先派遣三人分头抄谱，故如今我们可见书写乐谱确实有三种笔记。

待洛阳法事活动结束后，梁行德将所抄乐谱张贴到"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文"的背面，携带回敦煌，然而在归途中他遇难身亡。侥幸的是《讲经文》与乐谱被弟子完整无损的带回，后置于莫高窟三界寺"闲杂文书"中，不久后被封存在敦煌都僧举行过殡仪的石窟内，一直沉寂了近千年，本世纪因藏经洞被发现，才白于天下。

同样出土问世于藏经洞的"琵琶二十谱字表"于一九五九年由赵元任先生从法国将复制件带到美国而公诸于世，此乐谱书写年代据考最早不超过八五一年，晚不过一00二年，经对照正是敦煌张义潮所统归义军统治时期。

另外与其同时，专家学者还陆续发现有一百四十五首的《敦煌歌辞》。这些经敦煌先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稀世珍宝，为我们今天解开西域乐舞和古乐谱之谜提供了确凿的历史依据。